

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演变*

李意**

一般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中的极端派别及其思想和行为,具有政治性、排他性和暴力性特征。有学者指出:“主流的原教旨主义主张开展合法的伊斯兰运动,反对暴力恐怖主义,而极端主义不仅在思想观点上是极端的,在行动上也是极端的。”^① 伊斯兰极端主义崇尚暴力,绝对排斥异教和外来影响。它以伊斯兰教法作为判断是非、衡量一切的标准,主张严格甚至僵化地遵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旨教义和传统;不断强化“战争地区”(Dar al-Harb)^② 与“伊斯兰地区”(Dar al-Islam)^③ 的二元对立,鼓励采取激烈手段和暴力方式同异教徒作战。^④ 不仅如此,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还是导致暴力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它在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不妥协性。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合法性解释,还为其提供了组织准备,很多恐怖组织最开始就是由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而来的。^⑤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9世纪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的罕百里学派。该学派的创始人伊本·罕百里是“严格遵循圣训的人”,他以坚持伊斯兰教传统、反对任何标新立异而闻名。他试图通过回归原初的伊斯兰教义来维护伊斯兰教的纯“阿拉伯属性”,树立伊斯兰教义是“经典的伊斯兰,是圣门弟子之踪迹的伊斯兰”等基本观念。^⑥ 他的教法论述由其学生整理并收集成册,后来成为萨拉菲主义的核心内容。18世纪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瓦哈比运动吸收了罕百里学派的思想,它在与沙特家族联盟的过程中,不仅为沙特领土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也带来了影响沙特政权合法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本文通过概括和总结沙特伊

斯兰极端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分析其原因、特点及其影响,旨在揭示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基本轮廓。

一、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演变

18世纪的瓦哈比运动深受罕百里学派的影响,推动了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萌生。瓦哈比派自称萨拉菲主义者,并被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早期形态。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迅猛发展期,瓦哈比主义迅速向外输出和扩张,其中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与世界各地非官方的伊斯兰运动,包括宗教政治反对派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并在客观上助推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以来,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入快速升级期,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使沙特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一)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萌芽期(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践的萌芽期。期间,极端的瓦哈比派打着清除伊斯兰“内敌”、严惩无视沙里亚法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攻击恐怖主义辨析”,《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9页。

② 指不接受穆斯林统治,而是需要穆斯林用“圣战”征服或解放的地区。

③ 指穆斯林居住区或已经伊斯兰化的地域。

④ Alexander R. Alexiev, *The Wages of Extremism: Radical Islam's Threat to the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New York: Hudson Institute, March 2011, p.15.

⑤ 杨恕、蒋海蛟:“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62页。

⑥ [埃及]穆罕默德·阿迈拉著:《伊斯兰思潮》(阿文版),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8、67、92页。

和亵渎瓦哈比派戒规部落等旗号,掀起了两次影响深远的极端暴力浪潮。

第一次极端暴力浪潮发生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瓦哈比派军队主要由那些在宗教保守思想熏陶下视死如归的“圣战者”组成,他们把向非瓦哈比派穆斯林发动“圣战”视为合法化。1802年,瓦哈比派攻占了什叶派圣地并血洗卡尔巴拉和纳杰夫,公开屠杀包括妇孺在内的数千名什叶派民众,拆毁先知穆罕默德外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侯赛因·伊本·阿里(Husayn ibn Ali)的陵墓。1803—1804年,瓦哈比派相继攻克麦加和麦地那,捣毁了包括先知穆罕默德墓在内的300多处历史胜地,把定居麦地那的土耳其人几乎全部驱逐。^①

第二次极端暴力浪潮发生在20世纪初现代沙特形成时期。由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和力量对比悬殊,早期沙特王国曾两度衰亡。1902年,沙特家族领袖、现代沙特王国奠基人伊本·沙特重建沙特国家。他沿袭早期沙特国家的历史传统,恢复沙特家族与瓦哈布家族的宗教政治联盟,尊奉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为官方意识形态,借此扩大和稳定新兴政权的社会基础。1912年,伊本·沙特与瓦哈比派联手组建认主独一兄弟会,即伊赫万运动(Ikhwan Movement),促使贝都因人完成定居化,并由此开创了沙特王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伊赫万运动。其目的是迫使贝都因人告别游牧生活,迁居到具备完整宗教功能的定居点,此即希吉拉(迁徙)。游牧民被要求接受瓦哈比派教义,承认沙特家族是新兴伊斯兰国家权力的掌控者,承认伊本·沙特是瓦哈比派的伊玛目(伊斯兰法学权威),并且献身于沙特国家的“圣战”事业。^②在这一时期,宗教学者伊本·阿卜杜·拉蒂夫协助沙特国王,依靠强制性手段推行伊赫万运动,包括采取黎巴嫩史学家阿明·赖哈尼所描述的那些手段——“或是刀剑先于说教,或是说教继以刀剑,酌情而定。”^③

(二)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迅猛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自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后,伊斯兰激进势力和极端势力正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并快速蔓延到伊斯兰国家,成为

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急剧变革带来的社会动荡衍生出不少社会弊端,促使沙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进入迅猛发展期。极端思想催生激进行为,瓦哈比派极端分子将对政府的不满转化为具体行动,借机武装反抗沙特王室政权,其中以麦加清真寺被极端分子攻占事件的影响最大。1979年11月20日,在激进分子朱海曼·乌塔比率领下,约500名瓦哈比派武装分子以伊斯兰救世主马赫迪的名义攻占了麦加清真寺,囚禁了在里面朝觐的穆斯林,要求回归伊斯兰原始教义,废黜沙特王室。^④事件发生后,沙特军队前往镇压,经过两周的围攻,才完全控制住局势。

1991年5月,在沙特被称为“觉醒的教士”的两位年轻乌里玛领导了带有极端色彩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他们主张发动“圣战”推翻沙特王室统治,并向沙特国王呈送了请愿书,继而在第二年又向政府递交了《劝诫备忘录》,从而掀起了以宗教为旗帜的反政府浪潮。该运动要求重新确立伊斯兰教的绝对地位,用沙里亚法全面支配沙特社会和政治生活,并由伊斯兰主义者接管国家最高权力。对此,沙特政府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矛盾与冲突,但新伊斯兰主义者对政府的抵抗仍然不断升级,对政府充满敌意,甚至指责沙特政府为卡菲尔(异教徒)。^⑤1993年5月,6名极端原教旨主义者公开宣布成立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gitimate Rights, CDLR),试图借助西方国家关注的“沙特人权”问题来制造舆论、扩大影响,谋求外界的同情与支持,以迫使政府在外界压力下作出妥协和让步,此举被视为伊斯兰激进人

^① Joshua Teitelbaum, “The Shiites of Saudi Arabia”,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Washington D.C.: Hudson Institute, Vol.10, 2010, p.74.

^② Christine Moss Helms, *The Cohesion of Saudi Arabi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13.

^③ [黎巴嫩]阿明·赖哈尼著:《近代内志及其归属地区史》,时代出版社,1928年,第137页。

^④ Ghassan Salame, “Islam and Politics in Saudi Arabia”, *Arab Studies Quarterly*, No.3, 1987, p.311.

^⑤ 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0, p.38.

士对沙特政府最直接的抵抗。该组织以在英国伦敦建立的总部作为海外基地,并与国内的伊斯兰主义者遥相呼应,开展反政府武装活动。1995年11月,沙特的极端宗教反对派势力袭击了美国驻沙特国民卫队代表团,造成当时沙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

除了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外,这一时期的什叶派极端势力也不容小觑。在什叶派内部,主流的什叶派穆斯林主张和平、包容,对不同的教派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反对无原则的教派纷争;而宗教极端主义则鼓吹教派冲突,甚至把不同教派的信众视为敌人,主张在肉体上消灭他们。因此,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激励和推动下,沙特什叶派的极端势力与政权的关系进入严重对抗时期,并首次对沙特家族统治构成严重威胁。1979年11月28日,沙特爆发了现代历史上什叶派首次公开反对沙特家族的示威活动。^① 东方省哈萨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不顾政府禁令,公开庆祝什叶派的重要宗教节日——阿舒拉节,约万名什叶派穆斯林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抗政府的不公正待遇,要求实行自治。示威游行迅速蔓延至整个东方省,参与者袭击了英国阿拉伯银行,还焚烧汽车、捣毁商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政府不得不紧急派遣军队封锁哈萨地区以稳定局势。1980年2月初,在霍梅尼返回伊朗一周周年之际,沙特哈萨和卡提夫地区的什叶派再度举行大规模游行,并演变为更为严重的骚乱。参与者高举霍梅尼画像,要求释放首次示威活动中被捕的什叶派穆斯林,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沙特政府的镇压进一步激化了什叶派的对立情绪,加剧了局势的紧张,使双方的仇恨情绪不断蔓延。

(三)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快速升级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1991年以来,沙特籍极端主义分子本·拉丹建立的“基地”组织将袭击目标设定为打倒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腐败政权”。该组织以建议和改革委员会的名义多次以公开信的形式谴责沙特政府并要求国王辞职,并把沙特王室视为“叛教者”和“美国的走狗”,扬言对沙特政权发动“圣战”,使沙特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危机。1995年和1996年,沙特利雅得和胡拜尔的炸

弹袭击事件标志着“圣战”运动登上了沙特的政治舞台。进入21世纪以来,沙特王室和宗教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更趋激烈,“极端保守宗教势力正日益感到自己远离‘新沙特’,他们因此变得愤怒,随后转向彻底的叛乱”。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在沙特国内逐渐活跃。2003年,沙特政府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引起“基地”组织的暴力对抗。同年3月,沙特贾兹拉地区发生爆炸。自此,“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沙特境内,针对沙特政府和平民以及外国人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同年11月,沙特政府悬赏缉捕“基地”组织成员并安排安全部队进行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拉开了围剿极端组织的序幕。由于“基地”组织袭击利雅得秘密警察大厦,在延布、胡拜尔和利雅得发起多次针对外国人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活动,并在吉达、利雅得和嘎西姆等地区经常引发武装冲突,沙特政府开始出台“去极端化”的反恐策略,加大了全面反恐力度,专门发起了针对“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严厉打击和清洗行动。

2014年6月29日,“伊斯兰国”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家”,宣告了第三次国际“圣战”浪潮的到来,也标志着国际“圣战”运动从“基地”组织水平型国际恐怖网络向“伊斯兰国”开疆拓土型准国家实体的转型。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基地”组织建立“哈里发国家”只是一个梦想,那么“伊斯兰国”宣布“哈里发国家”的建立则标志着恐怖主义新纪元的诞生,它带来了自7世纪逊尼派和什叶派分裂后中东历史上最动荡的时刻。“伊斯兰国”反对沙特王权,并不断向沙特境内渗透,同时制造了多起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2014年12月3日,沙特东部城市哈萨遭到“伊斯兰国”的武装袭击,导致8人丧生;12月24日,该城附近一个村庄又遭到袭击,沙特警方抓获了77名与“伊斯兰国”有关的人员;不到一周之后,沙特警方又宣布成功捣毁“伊斯

^① Joshua Teitelbaum, “The Shiites of Saudi Arabia”,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Washington D. C.: Hudson Institute, Vol.10, 2010, p.82.

兰国”在沙特的一个分支,共抓获该组织93名成员;2015年5月,“伊斯兰国”在沙特东部制造了两起针对什叶派清真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共造成25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如果说“基地”组织的核心圈是沙特极端保守的“圣战”萨拉菲派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极端派别的结合,那么“伊斯兰国”的核心圈主要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与萨达姆复兴党政权残余势力的结合。它们同属“圣战”萨拉菲派,可谓是一体两面,在思想的极端性、手段的残忍性和诉求的偏执性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此外,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造成地区什叶派势力强势崛起,而沙特政府对什叶派要求的一再敷衍和漠视导致激进思想在什叶派中逐渐上升,乃至2011年3月11日被沙特什叶派确定为“愤怒日”,当天沙特境内爆发了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什叶派政治运动。自此,什叶派政治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倾向,其抗议和叛乱活动愈加频繁。此外,“伊斯兰国”极度仇视和残害什叶派的极端思想和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沙特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紧张关系。2014年11月,哈萨绿洲的什叶派被极端分子袭击,造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沙特什叶派最惨重的伤亡事件;2015年5月,沙特东部卡提夫地区的什叶派清真寺遭遇自杀式袭击,造成多人死亡。这两次事件都是“伊斯兰国”所为,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挑起沙特两大教派间的矛盾,加剧沙特的政局动荡,为“伊斯兰国”向沙特渗透创造条件。为了寻求自我保护,沙特什叶派还组建了安全委员会,并自称人民动员组织,负责巡逻街道、检查进入清真寺大门的车辆和人员等,由此也表现出什叶派对沙特政府的极不信任。由于沙特政府总体上对什叶派采取强硬措施,致使双方矛盾不断激化,什叶派激进势力也成为沙特极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演变的原因

纵观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由萌生到迅猛发展,再快速升级的发展历程,其原因主要是伊斯兰教罕百里学派的宗教保守主张成为其思想源头,沙特政府对瓦哈比教派的庇护及其对什叶派的打压,以及周边国家的政治发展对其产生的潜在深远影响。

(一)思想源头:伊斯兰教罕百里学派的宗教保守主张。沙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践最早源于18世纪兴起的瓦哈比运动。在那一时期,阿拉伯半岛交通闭塞,在很大程度上可谓与世隔绝,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加之外部势力不断渗入,阿拉伯半岛面临着被分裂的危险。经济的凋敝、奥斯曼土耳其外族的压迫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为瓦哈比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瓦哈比派创始人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布(Ibn Abdul Wahhab)是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学者和法官,他继承了伊本·泰米叶的复古主义思想,主张回归经训,净化宗教,强化一神信仰。在他看来,认主独一必须身体力行,避免任何可能渎神行为。为此,瓦哈布提出了极具排他性和进攻性的“定叛”(Takfir)、“圣战”(Jihad)等观念。他在理论上和伊斯兰教其他派别存在较大分歧,将苏菲派、什叶派和其他逊尼派穆斯林统称为卡菲尔,意即不信道者,尤其对奥斯曼帝国各地盛行的苏菲派教主崇拜和拜谒圣墓深恶痛绝,将这些行为归属为大逆不道。他对什叶派穆斯林口诛笔伐,称其为“忤逆者”。对于那些听闻正道召唤却不肯顺从者,他主张对其发动“圣战”。因其主张回到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圣门弟子的时代,因此根据他名字而命名的瓦哈比派也被称为萨拉菲派(尊祖派)。

尽管瓦哈比派本身并不等同于宗教极端主义,但它吸收和借鉴了罕百里派的宗教保守主张,不但培育出众多持有原教旨主义思想的瓦哈比教徒,而且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因信仰绝对化而导致观念和行为极端化的极端分子。相较于主流的伊斯兰文化,瓦哈比主义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经常伴之以净化信仰运动,什叶派、苏菲派因不符合瓦哈比派对伊斯兰教信仰的解释而成为其批判、打压或武力征服的对象,以至于往往出现教派冲突的极端化和暴力化。

随着瓦哈比派思想的传播,当时的部落酋长穆罕默德·本·沙特意识到瓦哈比派的强大影响力,决定借助其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1744年,穆罕默德和瓦哈布正式结盟,其中穆罕默德为国家政权领导人,而瓦哈布则成为宗教权威的代表。双方的结盟标志着沙特王国的兴起,瓦哈比派思想为沙

特领土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宗教的福音及剑的力量”,使内志(阿拉伯半岛中部)各部落和村镇都皈依了瓦哈比派,并臣服于沙特家族,形成了瓦哈比国家的雏形。^①从此,沙特家族王权与瓦哈比派的结合一直延续至今。1811年第一沙特王国建立后,瓦哈比派的势力几乎扩展到整个阿拉伯半岛,后又成为1824年建立的第二沙特王国的立国基础和社会粘合剂,并于1932年现代沙特王国建立后被确定为沙特国教。^②就这样,沙特家族、王权与瓦哈比派结合起来,构成了沙特君主制政教合一制度的主要内容。随着宗教势力的不断膨胀,瓦哈比派对占领地区不屈服的民众采取了残酷的迫害手段,并将观点不同的穆斯林宣布为“不信道者”和“伪信者”,予以排斥和压制。为了统一思想和消除异己,瓦哈比派在向当地民众强制灌输瓦哈比教派思想的同时,还杀害了大批传统派学者,并焚毁了大量传统派经典。

(二)政策指引:政府庇护瓦哈比派并压制什叶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瓦哈比派向外大发展时期,它借助经济援助和宗教文化交流迅速向外输出和扩张。其中,输出瓦哈比主义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与包括一些国家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组织在内的世界各地非官方的伊斯兰运动建立广泛和密切联系。由于沙特政府积极支持瓦哈比主义在全球传播,并凭借国家政权和巨额石油财富大力资助瓦哈比派的全球扩张和发展,因此其不可避免地庇护、支持和资助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极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穆罕默德·库特布和赛义德·库特布都曾到沙特避难;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赛义德·毛杜迪也深受瓦哈比学说的影响,其组织还长期接受沙特资助。这些激进组织制造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不能不说与沙特瓦哈比派的支持与传播有一定关系。除了逊尼派极端思想导致的激进行为之外,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还出现了另一条主线,即什叶派的激进行为愈演愈烈。可以说,极端主义思想的两大阵营,即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情绪与日俱增。由于长期遭受政府的严酷迫害与边缘化,沙特什叶派掀起了几次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

活动。而沙特政府的镇压则进一步激化了其与什叶派的对立情绪,二者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和蔓延。

一是逊尼派极端思想导致的激进行为。在沙特曲折的建国历程中,宗教曾为沙特家族开疆拓土、统一半岛、建立国家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政治合法性。然而,随着现代沙特王国的建立与发展,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天平逐渐向前者倾斜。沙特家族通过联姻和血亲关系缔结的政治盟友远远超越了瓦哈布家族的范围,瓦哈布家族在家族政治模式中的地位下降。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沙特的高级宗教职位不再由瓦哈布家族垄断,沙特家族政治的世俗色彩日益增强。特别是在费萨尔执政期间,由于国家大力推动乌里玛(宗教学者)的国家化进程,使乌里玛控制的宗教机构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随着沙特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变化,乌里玛阶层开始分流,并且出现了由反对沙特政权的乌里玛领导的新原教旨主义反对派。

海湾战争是沙特宗教反对派与王室进一步决裂的导火索。随着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强势输入,沙特的伊斯兰传统文化与价值取向受到冲击,各种复杂矛盾导致新伊斯兰主义者(即当代萨拉菲主义者)的产生。他们的思想来源同样基于罕百里法学派,主张严格遵循古人遗训,在宗教、政治和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一系列极端主张,把其他与其极端思想不符的一切事物都判定为“非法”,并常常攻击或诋毁与其主张相左的学者。

二是什叶派极端思想导致的激进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出现了新的元素,一直以来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沙特什叶派开始奋起反抗,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更是激发了沙特什叶派教徒争取自身权利的勇气,进而使什叶派的反抗行为出现了极端主义因素。事实上,教派冲突自1811年沙特王朝建立以来就已开始萌生。沙特瓦哈比派始终以“净化”信仰、排拒异端为由反对非主流的什叶派和苏菲神秘主义派别,其影响一直延

^① 王铁铮、林松业著:《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2页。

^② 方金英著:《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

续至今。沙特什叶派一直在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其原因主要包括:瓦哈比派意识形态对什叶派的排斥和仇视,什叶派聚集区的石油收入分配不公,以及什叶派与伊朗的关系,它们构成了影响沙特什叶派历史命运的主要因素。现代沙特立国后,逊尼派直接控制国家关键部门,什叶派则缺乏参政渠道,几乎被排除在行政、司法、军队等领导阶层之外。在经济方面,什叶派穆斯林也没有资格分享沙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财富,生活水平低下,生活处境艰难。由于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什叶派对沙特政权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这也促使什叶派激进势力对政府采取报复性的极端行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及其“输出革命”影响下,沙特东方省什叶派穆斯林建立的反政府组织,如伊斯兰革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和新伊赫万运动(Neo-Ikhwan)登上历史舞台。它们都受到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思想的影响,其成员多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追随和效仿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构想,主张创立“真正的伊斯兰共和国”,从而取代沙特王室统治。

(三)助推力量:周边国家剧烈变动的政治局势。在沙特宗教极端主义演变过程中,有一种助推力量不容忽视,即周边国家或区域政治发展对于极端主义暴力事件的影响。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1990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到2010年的中东剧变,这些事件成为一股潜在性力量。它们并非是推动极端主义暴力事件发生的直接催化剂,而是通过诱发局势危机,从而加速社会变革,促使利益各方相互作用,最终导致极端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此同时,由于区域政治危机加重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因而当局可能产生过激和过度反应,从而为极端分子提供了将其意识形态付诸实践的好机会。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对什叶派组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革命使什叶派民众的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从分散的少数教派转变为意识形态统一的力量。对于逊尼派暴力极端主义而言,1979年底的

苏联阿富汗战争对其影响深远。该地区大多数国家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对整个地区构成了直接威胁,因而对阿富汗“圣战者”的支持态度是符合该地区包括沙特在内的保守国家的政策利益的。宗教极端分子利用某些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立场,参与了阿富汗“圣战”的全球招募活动。来自中东等地的暴力极端分子集合于一个共同阵营,在这个阵营中进行的相关训练后来都在该地区宗教极端活动中发挥了作用。从此,无论是沙特逊尼派极端主义,还是什叶派极端主义都开始发生转变,即从原有破碎的极端力量转变为有组织和训练有素的武装运动。

1990年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再一次促进了中东地区安全范式的转变。特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不仅改变了伊斯兰世界秩序,而且萨达姆对科威特和沙特东北部的入侵,是沙特建国以来遇到的最大、最直接的威胁。不仅如此,海湾危机期间的不稳定因素导致该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海湾危机使沙特宗教团体逐步分裂,扩大了觉醒派(Sahwah)与传统宗教机构之间的政治差距。当沙特政府决定建立国际联盟来解放科威特时,传统的沙特乌里玛支持政府决定,而觉醒派则反对这一决定。其间引发的冲突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并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与20世纪80年代无组织的暴力反抗不同,海湾危机之后的极端暴力事件转变为有组织的、训练有素的极端主义行动。特别是以本·拉丹为首的“基地”组织,利用沙特国内权力争斗、经济发展失调、治理赤字等现实危机,以及保守宗教势力宣传的反西方思潮,塑造了一套强调暴力抗争的政治话语体系,试图消灭入侵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中的“腐败政权”,建立一个纯正的伊斯兰国家。极端分子强调恪守伊斯兰原旨教义和早期瓦哈比派宗教理念,否认沙特家族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抨击沙特家族的专制统治背离了伊斯兰教,严重威胁了沙特的安全局势。

2003年伊拉克战争在意识形态和行动层面上进一步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帮助。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入侵伊拉克恰巧是“基地”组织描述的帝国

主义侵略思想的写照。对于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指控,不但损害了美国的可信度,而且使该地区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纷争进一步升级;在行动层面,伊拉克的混乱环境成为“基地”组织在逃人员的避难所。伊拉克战争使“基地”组织能够在伊拉克建立新的训练营,以取代其在阿富汗失去的训练营。不仅如此,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还引发了一场新的“圣战”运动,“基地”组织开始向邻国发起攻势并不断扩张,从而在沙特掀起了最具破坏性的恐怖主义浪潮。

2010年中东剧变使该地区原有的政治生态被打破,地区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伊朗与沙特双雄并起成为最显著特征。由于沙特与伊朗分别是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的主要代表,因此随着教派矛盾日趋升温,地区矛盾更加复杂难解。“这场冲突不仅有效地激化了伊拉克的教派主义,而且激化了整个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矛盾。”可以说,在中东地区原有权力格局日趋瓦解之后,教派矛盾正取代民族国家矛盾,成为该地区主要矛盾之一。极端恐怖势力乘机作乱,各种极端恐怖组织乘机滋生。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国”组织用极端意识形态招揽新成员,大肆扩大恐怖袭击范围,通过对穆斯林进行所谓的“正统性”改造来“净化伊斯兰教”,鼓吹其终极目标是消灭“战争地区”,使全球变成无国界的“伊斯兰地区”。它以取代沙特政府而成为逊尼派教义的捍卫者为目标,逐步发起对沙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

三、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

从三个历史时期来看,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沙特政治局势和安全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在历史萌芽期,从1744年沙特部落首领穆罕默德与瓦哈布正式结盟,到1932年瓦哈比派被确定为沙特国教,瓦哈比派完成了与沙特家族结盟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的历史使命并延续至今。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从根本上决定了沙特什叶派的历史命运。19世纪初,极端瓦哈比派攻占并血洗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从而导致沙特逊尼派与什叶派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之前,这两大宗教派别虽然有分歧,但都尊崇先知穆罕默德,捣毁穆圣陵墓的行为等于是宣告与伊斯兰教为敌,站在了逊尼派和什

叶派的对立面。此举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穆斯林的集体愤怒,他们一致严厉谴责沙特家族及其瓦哈比极端派思想,这种行为也是瓦哈比派极端主义思想早期实践中最具有破坏性且影响力最为久远的事件。

在极端瓦哈比派鼓动下,纳季德地区的沙特家族与希贾兹的麦加圣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瓦哈比派的极端势力也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并制造了多起恐怖血腥事件。20世纪初期的伊赫万运动削弱了游牧民族同部落之间的联系,克服了游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有助于国家稳定。但与此同时,瓦哈比派教徒如同白色恐怖势力,其大肆掠夺非瓦哈比派教徒的财富,其军队逐步征服了哈萨、杰贝勒沙马尔、锡尔汉河谷、阿西尔和汉志等地区。瓦哈比派对包括千年以来一直掌管麦加和麦地那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人——哈希姆家族在内的其他阿拉伯穆斯林发动攻击,造成约几十万阿拉伯人伤亡。随着现代沙特王国的建立,伊赫万运动的极端分子在宗教狂热和权力欲的驱使下发动分裂国家的叛乱,成为沙特强化中央集权的主要障碍,最终遭到伊本·沙特的严酷镇压。伊赫万运动真实反映了瓦哈比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使游牧民定居下来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维持战争和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并为伊本·沙特提供了一支勇敢无畏的军队,帮助他完成了复国梦想;但另一方面,伊赫万思想的过度狂热使其在征服过程中频频采取强制性手段,暴力事件和极端行为屡屡发生。在征服希贾兹后,伊赫万运动所奉行的严格禁欲主义和宗教精神,“虽然能够帮助国家领土扩张,却没有能力使国家整合”。由于伊赫万理念与伊本·沙特的新政相去甚远,沙特政府在英国支持下于1929年底平定了伊赫万运动的反对派,并最终将伊赫万运动收编为沙特国民卫队。

在迅猛发展期,逊尼派发起了两次极端暴力运动。一次是1979年由朱海曼·乌塔比等瓦哈比派极端分子发起的武装反抗沙特王室政权的行动,该行动不仅严重损害了沙特王室的威望和宗教合法性,而且推动了沙特本土极端主义的发展。自此,瓦哈比派极端分子经常以净化信仰、反对“偶像崇拜”为由,采取种种非理性的武装行动,对沙特王室统治

和社会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次则是20世纪90年代初“觉醒的教士”发动的“圣战”。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相比,新的伊斯兰主义者所掀起的伊斯兰运动不仅表现在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和向宗教传统的回归,而且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什叶派极端分子也发起了两次骚乱,其不但对沙特政局稳定构成一定威胁,而且为沙特极端主义的发展增添了新内容。此后,沙特什叶派极端势力的抗议活动成为沙特教派政治中的长期性问题,沙特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纷争不断加剧并延续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方冷战格局终结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世界局势的变迁使原来在两极格局下长期被掩盖的宗教与民族等各种矛盾突然爆发,宗教与民族主义开始在国际政治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宗教极端主义因其影响巨大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国在海湾战争后长期屯兵海湾国家,加之它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问题上明显偏袒以色列的立场,加剧了中东国家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仇恨心理。宗教极端分子针对美国境内及其在海湾地区驻外机构等地的恐怖袭击活动更趋频繁,地区局势更加动荡。在此背景下,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进一步拓展,并对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反对沙特王室、什叶派反对沙特政权的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快速升级期,如果说全球范围的第一次暴力“圣战”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抗苏战争时期,那么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的极端势力的扩张,国际社会则迎来了第二次国际“圣战”浪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伊斯兰极端组织逐步向全球性暴力“圣战”组织转型,其典型代表就是“基地”组织的扩张。2001年的“9·11事件”、2002年10月印尼巴厘岛爆炸案、2004年3月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2005年7月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等重大恐怖事件接踵而至,凸显了“基地”组织的极端性和破坏性。作为极端瓦哈比主义思想的追随者,本·拉丹认为只有回归伊斯兰教传统,才能使伊斯兰国家保持自身文化认同。他利用“圣战”在普通穆斯林群

体中具有的巨大感召力,以“圣战”的名义从事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动。“9·11事件”后,在国际反恐战争高压下,“基地”组织逐渐从一个等级制组织转变为一个松散的国际“圣战”网络,但其破坏力和渗透力仍广泛存在。

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恐怖主义浪潮促使沙特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全面反恐上。除了不断强化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反恐合作外,还贯彻了内外结合的思路。与之前的反恐策略相比,沙特当局除了使用常用打击手段外,还尤为重视思想改造计划,以摧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限制暴力极端分子复员。沙特的改造计划包括伊斯兰教课程、心理辅导、艺术疗法和运动等计划。该计划旨在改变极端分子的世界观而非宗教信仰,这进一步凸显了意识形态在动员沙特宗教极端分子中的核心作用。为防止“伊斯兰国”入侵,沙特于2014年底在其北部与伊拉克交界地区修建了城墙,城墙上不但配备有瞭望塔、夜视监控摄像机、雷达探测设备和直升机等,还派3万大军驻守城墙。2015年4月,沙特国王正式指定在反恐领域内颇有名气的铁腕人物纳伊夫(2017年6月被穆罕默德·萨勒曼取代)为沙特新王储。纳伊夫早年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接受过培训,他曾在2003—2006年期间指挥打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深受沙特国王信任。在对外方面,沙特于2015年12月15日宣布组建包括40多个伊斯兰国家的反恐联盟,旨在打击极端主义组织直至其彻底消亡。该联盟的目标是“动员和协调使用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帮助成员国提高自己的反恐能力”。目前来看,沙特的改造计划似乎卓有成效,但绝不能就此推断出极端主义已走向衰落的定论。

四、结语

自19世纪以来,随着沙特家族、王权与瓦哈比派的紧密结合,沙特君主制政教合一制度逐步确立并日渐成熟。然而,在瓦哈比派与沙特家族联盟过程中,伊斯兰极端主义相伴而生并严重影响着沙特政权的合法性。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嬗变经历了历史萌芽期、迅猛发展期和快速升级期。

首先,与沙特国家兴起相伴而生的瓦哈比派尽

管并非纯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但其含有排斥异己、崇尚暴力的极端主义成分,进而成为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来源。起源于18世纪阿拉伯半岛的沙特瓦哈比派本身并不从属于极端主义,但它吸收和借鉴了以保守著称的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主张,在与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思想,进而成为沙特极端主义思想的理论源头。18世纪到20世纪初,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主要表现为观念形态的宗教极端主义,它强调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很少运用类比和公议。由于坚持正本清源,倡导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因而也被称为原教旨主义派。瓦哈比派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培育出众多持有原教旨主义思想的瓦哈比教徒,以净化信仰为目的批判和打压“异教徒”,甚至不惜用武力予以征服。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岛上建立现代沙特国家的同时,也为后来的极端主义埋下了伏笔。

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入迅猛发展期,通过对外输出瓦哈比主义影响极端组织,同时,沙特国内的逊尼派宗教政治反对派反对沙特王室以及什叶派反对逊尼派的教派斗争,都是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在这一时期,随着瓦哈比主义的迅速扩张,它不但与世界各地非官方的伊斯兰运动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而且培育、扶持了一些极端组织。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新伊斯兰主义者的活动主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要求沙特政府进行改革,但也不乏带有宗教极端色彩的暴力抗争,并日趋极端化。与此同时,瓦哈比派内部分化为忠于君主制的传统瓦哈比派和反对沙特王室的极端派别两大阵营,而后者逐步演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力量。它在威胁沙特政权的同时,通过对外渗透和扩张助长了全球性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发展,其典型表现是沙特极端分子与“基地”组织的密切关系。此外,什叶派骚乱也对沙特政局的稳定构成威胁,并使沙特什叶派的反政府活动带有暴力极端的色彩。

最后,进入21世纪以来,沙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全球“圣战”组织里应外合,给沙特国家稳定与地区安全带来严重挑

战。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进入急剧扩张期,沙特政府采取了多管齐下、内外并举的反恐政策和去极端化措施。尽管2017年7月“伊斯兰国”实体已基本被消灭,但其宗教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而“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长期存在和渗透,也将使沙特成为极端组织渗透和扩张的对象。可以预见,沙特伊斯兰极端主义将会继续存在。只要瓦哈比教权和现代沙特王权交织在一起,瓦哈比极端派别的保守要求和扩张诉求,就有可能成为威胁沙特国家安全或动摇沙特王室地位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沙特政权开始大力推行伊斯兰教温和化改革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程星原)